

序 言

“我们要自由的勇气”；让自由成为信念和行动 我们就会坚强起来。”这话是 1929 年美国俄裔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写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的挑战，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与和平所抱的希望，并未与伯克曼一起死去。而且它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早期，又重新在美国和欧洲抬头了。

这本无政府主义者著作的文集，是当代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们自己写的。它和另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献选集——《无政府主义者》——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由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根据已故的 C. 赖特·米尔斯提出的方案编辑的。在这本早先的著作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激进分子已提出了对国家的控诉，对如何走向美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的确，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并未发生，但是，百年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在高压和专横统治下产生的种种罪恶的抨击，已产生了相当重要的著作，而反政府的骚动也并不少见。

这本集子的作者代表了极不相同的观点。也许，有多少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多少无政府主义吧。但是，我相信，在情绪和气质上，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把绝大多数的反集权者联合了起来，这就是对权威的不信任，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诚关怀。然而，或许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个性的偏爱吧，这个文集里作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他们之中有巴黎公社社员和极端个人主义者，有战斗分子和和平主义者，有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有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有克鲁泡特金、戈德曼的年长信徒和年轻一代的活动分子。

编者在选稿时遵循了几个原则：力求提供不是随处可从报刊上得到的材料，提供一般读者通常见不到的资料；希望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见解中——从信奉自由意志论的个人主义者到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提取合适的样品；编者还试图使读者从这些稿件中重新感受到过去十年中无政府主义复兴的那种激情和紧迫感。这本文集告诉人们，无政府主义并不只是批判，它还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肯定。很多文章表明，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真诚的、有时是不知疲倦的活动家，而且还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由编者执笔的绪论，说明了当代无政府主义复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接下来两篇文章论述了当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性质。乔治·伍德科克这位多产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学家，在《无政府主义卷土重来》这篇文章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复兴既怀有感情也进行了批判。萨姆·多尔戈夫的《无政府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一文，在重新考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上，倾注了高度的才智。再下来是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文章。这两派的评论文章都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虽然方式完全不同。在题为“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这部分，包括有出自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自由》和《无政府状态》上的各种短篇文章。我以为它们乃是最近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所写的最漂亮的应时之作。最后一部分提供了三篇著名的论文，它们都宣称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就象它适用于过去几十年或几百年一样。

显然，这不仅是一本有趣的文献汇集。它里面谈的是年代久远的斗争——为反抗社会压迫和暴政，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在当代的再现。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向社会挑战的、有时是勇敢的声明，是一个未完成的、也许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

史剧的生动篇章。

不仅仅是致谢，而且是同志式的感谢才能和这本书的精神一致。首先应感谢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是他提出编这本书并且一直予以赞助。感谢保罗·阿弗里奇，这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学者，他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观察生活。感谢纽约市自由意志论者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们，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忠诚鼓舞了我。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迈阿密大学的学术研究所通过斯皮罗·皮特逊教务长给了我们所需要的财政援助。我永远是保罗·马辛的学生。最后，向我的亲属致谢。

第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的归来

1. 反抗精神的再现

特里·M. 珀林

无政府主义——照字义讲，就是没有政府的社会——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企图组织起来去破坏社会结构。无政府主义对其信徒来说，意味着一场反对邪恶的伟大斗争、一个反对贬低自己的非宗教改革运动，一场反对社会堕落的战斗，而国家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社会堕落的思想与现实。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反对权力主义：是一种不断造反的精神状态。

谁是无政府主义者？难道在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下，把社会上所有的造反者都包括进去吗？十九世纪中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第一个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①但是靠自己声明是不够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运动。它既没有党的路线，也没有党员守则。它可以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出现。埃玛·戈德曼，这个过去一百年间美国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所下的定义对人们是很有启发的。她说：“无政府主义是指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思想；从财产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身体；从政府的枷锁和束缚下解放出来。”^②

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者从不满足于国家形式的改变；他们要求完全废除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多半是些空想家，他们的计划极少

成功，他们既是革命的批评者，又是革命良心。已故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赫伯特·里德爵士说过：“社会为了超越它本身而存在”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艰苦卓绝、始终如一地奋力争取社会的根本改变。他们是社会上永不满足的少数人，想通过推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求达到人的至善。

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受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成见的损害。他们曾被看作是扔炸弹的狂人和头脑糊涂的空想家。其实，这都没有事实根据。虽然，个别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在十九世纪末，曾企图采取暴力和报复行动，但无政府主义通常是充满理想的少数人的社会运动。在言论和行动上，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战争、暴力、工业中的剥削、政治压迫、教育管制、宗教迷信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他们体现了一种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百多年以前，托马士·卡莱尔在谈论现代世界的特点时，就声称过了，那就是：“对无信义的统治者和骗人的导师们的反抗将无往而不胜”。^③

无政府主义复活了

无政府主义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又回到了欧洲和美国。普鲁东、巴枯宁、斯特勒、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戈德曼 这些十九世纪古典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充满战斗思想的著作 重新出版了。不过 无政府主义复活的最明显的表现 还不在于重印了他们的著作 如《互助论》或《上帝与国家》而表现在反对国家的具体行动和对政府不信任情绪的增长上，表现在对无节制地发展工业技术的痛恨以及对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上。

并非所有反政府的活动都是受无政府主义原则的鼓舞的。激进运动的成员中，很少有人具有象那个名叫埃玛·戈德曼旅的吵吵闹闹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团体所具有的历史感。他们跑到纽约第

五街一个劲地嚷：“埃玛在 1910 年说的，我们今天还要再说一遍。”^④但是在激进圈子内外，却很少有人怀疑无政府主义的异端已经再次兴起。

当炸弹在某一公司的总部爆炸，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从苏联逃往西方，当年轻的激进分子和无辜的旁观者在美国政治集会上被警察殴打，当一群擅自抢占房屋者占据伦敦东区的建筑物时，官方的典型反应都是把这些事件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当公共秩序受到威胁，就说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干的。这两个名词通常是被划上等号的。

在美国，当代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促使官方去搜寻够格的替罪羊，并且照例要从内部去寻找敌人。由于美国传统的“历史遗忘症”，分析者们把有关劳工争斗，社会和地区的冲突，街头的暴行，不公正的死刑判决等长篇报告都压了下来，而只使用更新的老生常谈。^⑤政治科学家本杰明·巴伯生动地描绘了这幅图画。他说：无政府主义“存在于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和旗帜中；存在于纽约市政厅实验室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制造恐怖武器的业余化学爱好者之中；存在于反权力主义的青年左派不同信仰结合的梦幻之中；存在于街头剧场和青年国际党员可笑的大吹大擂之中。”^⑥无政府主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自十九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米哈依尔·巴枯宁变成了阿比·霍夫曼，两个人都被描绘成身披斗篷的狂人，手中高举炸弹，满不在乎地随时准备去腐蚀天真的信徒。

历史地看，官方的老一套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少是刺客或炸弹投掷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宣传鼓动者，是有思想、有理想的人。^⑦但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渴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六十年代，好多激进分子身上带着夸大其词的标签当作

挑战的标记，以表示他们对现实的非难。就象一个著名的摇摆舞团体形容的：

我们是混乱和无秩序的军队，
人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并且为此
感到非常骄傲。^⑧

造反者和他们的敌人就这样彼此具体化了。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非法而自豪；政府当局则利用逮捕、折磨、公审以及宣传等手段来履行他们对现状承担的义务。通过臆造的斗争产生的小争论往往是显得离奇的——芝加哥七人的审讯就是明证。而对抗的偏见并以此自豪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复活的一小部分。鼓舞这个激进运动的是它的一整套理想和要求变革的意识。

自普鲁东和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设计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模式：一种建立在废除权威、在社会团结的自愿约束下，个人自由得到发展的愉快、纯朴、和平、人人平等、和谐的公社生活。怎样达到这一目标至今还是一个问题。十九世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专制社会的环境里成长的。他们认为，革命、而且可能是暴力的革命，是社会变革不可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愿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等待‘条件成熟’”极力主张现在就革命。他们通过言与行的宣传，希望把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把言辞激烈的小册子偷运过国界，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中间搞鼓动，甚至搞暗杀活动，这些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向人们指出不自由并不是注定的。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是能够得到它的。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种观念上，只要这种观念普遍被人们相信，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制度就是安全的。政府之所以仍然巩固就是因为人民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都是必需的。”^⑨

破坏政府的必要性这种观念，至今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目标。近代的新左派、新右派和反主流文化的鼓吹者都被这样一种假定所激励，即人们的意志产生的理想能够实现革命的转变，因此，无政府主义具有不妥协的特性，一种道德上的绝对主义，它的强调个人行动也使它成为对青年人具有吸引力的哲学。就象克雷孟梭有次幽默地说出的：“我为每一个到二十岁时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感到惋惜。”^⑩

新左派的口号——学生权 黑人权 工人管理 社区管理 妇女自由——远不止是对近代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反应：它们体现出对思想力量的肯定。无政府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强调面对面作出决定而保持其活力的“分享民主制”，也是制定托马斯·杰斐逊原则的一种力量。新左派希望提出问题以唤醒公众舆论和动员被压制的少数派。正象《左派研究》杂志的两位前编辑所说：激进分子希望“提出人类自由概念的基础，以表明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安排”。^⑪

象十九世纪许多理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新左派发现他们难以在工人阶级中获得同情和关注。他们更多的是从摆脱了幻想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从一旦识破资产阶级伪善的学生们当中，从先锋派的艺术家中，有时，还从觉醒了的少数派成员中吸收新成员。象他们的先行者一样，新左派被诽谤、追捕和辱骂，被赶入地下，有时还被监禁起来。

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上来说，新左派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隐晦的用语。它所指的活动分子包括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民权抗议者到七十年代的各地下激进党派。它范围广泛，从黑人分离主义者、工人管理的鼓吹者到大学改革者以及免费学校的组织者。它们千差万别，是自发性把新左派联合在一起的。它和老左派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一种强制的正统思想，没有已指明的革命道路。

的确，新左派中有一批清教徒似的狂热和恪守教条的马克思

主义者，包括从进步劳工党到黑豹党里的某些成员。就思想的统一以及为净化思想而进行的内部斗争而论，新左派和老左派是一样的。新左派令人感到惊奇和新鲜的是它缺乏确定性和计划。与此相反，人们发现他们对社会改革采取一种实验态度，愿意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它们（“事物是怎样就说它是怎样”）而不受教条的约束。就象旧金山一个名叫“挖掘者”的鼓吹公社制的团体所警告的：“谨防那些领袖、英雄和组织家，留神这伙废物。警惕那些结构迷。他们不理解、而我们知道体制之不起作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废墟上。”^⑫当霍华德·吉恩，这个新左派最有学问的活动家之一，把他的目标说成是尽力“参加一点点我们时代的社会斗争”^⑬时，就表明行动的谨慎。这种志向——稍事参加并尝试革命活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在信奉灵活多变的策略和避免思想上的划一方面，它保持了无政府主义者自发性的特殊风味。

无政府主义者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从完全的共产主义到同样狂热的个人主义，其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处方，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到无政府资本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者范围之广泛，可从新右派产生的现象中看到其最近的标记。一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取名“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是从美国保守的青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以拥护自由的年青美国人（YAF）著称。他们提出一种反政治的纲领，要求把终止公众教育、征兵、赋税、“抢劫”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作作为全国的主要任务。但是在私有财产的问题上，新右派不准备向他们的对手新左派让步。

奇异的反击姿态显现了。一个早先的保守主义者，成了自由意志论者默里·罗思巴德和卡尔·海斯的追随者，成了完全自由经营企业的信奉者。他把自己看作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宣称：“部队征兵必须被看作是今天存在的最野蛮和不公正的政府制度……自由意志论者应该在全国各地和抵制服兵役的人们结成同盟。”^⑭

我自己就遇见一个右派律师，他献身于自由意志论者的事业：组织纳税人抗税，办理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案件。还撰写修正主义的文章，谴责美国发动冷战。他欢喜一种反文化的生活格调。跑到一些大专学校去进行宣传，编了一份无政府主义的月刊，对无政府共产主义表示深切同情。当我问他这种工作如何与他作为一名律师的工作相一致时，他回答说：“我们要用法律去摧毁法律。”

无政府主义的动力可以从所谓反文化运动中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穿着打扮、家庭生活、性道德和公众形象方面往往是放荡不羁的。当代的“颓废派”看上去与其说象穿着整洁的、资产阶级化了的马克思，不如说更象那个完全不修边幅的巴枯宁。然而把新文化与无政府主义连结起来的不只是外貌。

许多青年人在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趋向——都市化、划一化、工业技术进步引起的效率、计划化和合理的社会改革——挑战时，抛弃他们家里的那些理想。这不仅是一代人的造反。这场战斗更接近十九世纪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小说中对价值的全盘否定。强调人的感觉经验、面对面的冲突、公社生活，这些都与前辈无政府主义同志们的追求有相似之处。

象其他异端运动一样，反文化运动注定是短命的。既存势力轻而易举地收买了反文化的人们或使他们改变了信仰。但这一运动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尤其在价值领域。每个拒绝入伍的青年人，每个拒绝在郊区过与世隔绝的小家庭生活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家庭，每个欣赏自主政治行动的可靠性、而反对政党政治的权威的年轻造反派，都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

年轻的造反派往往受到挫折。趋势对他们不利。政府变得更强有力，它管理老百姓的权力更大了。西德的鼓动家们，荷兰的卡包特斯，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追随者在危难中懂得了：革命的机会少得可怜。但是，象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代无政府主

义者一样 他们经常问 怎么办？

在什么地方行动？行动的适当舞台在哪里？是应当留在城市还是应该在荒野上创造一个新社会的缩影？这种辩论并不新鲜。哈里·凯利 这个埃玛·戈德曼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门徒，就曾劝说过那些想离开城市战斗舞台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几年以后，他自己就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村草地上建立了一个最成功的和永久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他发现，在警察经常的干扰下，要使工人阶级改变其信仰是没有指望的。他把无政府主义引向一个方向：在自由意志论者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小型的、互助合作的社会^⑮。

无论老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新无政府主义者，都一直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指责为反动派，指责他们向后看，以求延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进步是指无限的都市化、自动化、异化和通过经济与权力的集中来协调人类生活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寻求、并且一直期望制止现代化的趋向。不过，罗伯特·尼斯比特 这位保守的社会理论家发现：无政府主义者早就认识，并且一直在探索两百年来最关紧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对公社的探索。尼斯比特说：克鲁泡特金和他的继承人为一个“真正的和持久的公社”坚持不懈地工作。他们想建立一种无结构的结构，“就象乡村、自治团体和自治区那样，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非常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在人的智力和手工技能方面，也有一种天然的分工。”^⑯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且一直到今天，许多青年人，也有一些老年人 在“回到田园”的新浪潮中 离弃了城市。这不仅仅是由于厌恶可怕的城市生活，多数人是想从接近土地的生活中求得纯朴和内在的美德。另外一些人则想建立一套经济管理方法以实现人们的彻底平等。他们厌恶竞争的资本主义，对正统的社会主义保持等级制度的做法同样感到失望。新的巴黎公社社员们追求一

种“天然的”经济秩序。其中很多人甚至今天还继续过着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田野、工厂和作坊》中所描绘的那种生活。没有人占有财产，食物是公共的，工作是为了集体而不是谋私利，虽然和外界经常有商业上的来往，但目标是自给自足。这种公社绝大多数在经济上都失败了。

但归根结蒂，公社运动是要给劳动重新下定义。一些年轻的“先驱者”常常不知不觉地把马克思早年对劳动异化的否定付诸实践。其中很多人经常穿着想象中农民穿的衣服，甚至说话也模仿农民。过着马克思所描绘的朴素共产主义的生活：“早晨打猎，下午捕鱼，晚上喂牛，晚饭后有兴致时，搞搞评论，而不是永远作猎人、捕鱼人、牧羊人或者评论家。”^⑩这几年，无政府主义者被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吸引。他们声称，马克思对异化的厌恶，对工业发展中人的问题的富有同情的处理，都不同于他后来的教条主义和党的刻板态度。很多无政府主义者走向工团主义——正象十九世纪末他们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先行者那样——并且极力主张工人自己管理经济。

没有一个组织，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行过如此彻底和激烈的攻击。当代的评论家默里·布克勤，赞同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并且和埃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说同样的话，而这两个人是向世界报道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暴行的首批激进分子。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对东方和西方国家制度的谴责看，他们实际上是超党派的——指出国家工业计划一点也不比无控制的竞争好：二者都浪费资源，都剥夺个人自由，都产生不平等和特权。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保存和分配权力，而他们则要消除权力。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要从道德的立场，而不是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待经济制度。因此，意见纷纭就成为这一运动的特征。有

些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又被叫做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才能保证个人自由。允许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起任何作用会取消人们得到自己劳动果实的天然权利。另一方面，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们则提倡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垄断是权力集中的先决条件，因而也是一种罪恶。他们期望出现一个公社的实体，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将保证所有人获得生活手段。在这两种看法之间，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案：工团主义、互助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各种混合配方。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方案含义不清，前后矛盾，因而他们在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上也产生了混乱。例如，他们把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看作人类解放的大事，承认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得以显示出来。很多人讴歌机器，认为它是被异化了的工人阶级的潜在的解放者。但是，所谓进步也并非不被腐蚀。俄国革命就演变成令人厌恶的专制制度，机器现在则象征着奴役而不是自由。发展带来了生态上的梦魇。

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继续在一会儿赞扬，一会儿又厌恶现代性之间摆来摆去。他们认为现在的工厂是会存在下去的，但又留恋农村公社。在他们期望形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观念的过程中，令人恐惧的现在和被理想化了的过去，彼此消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评论家，但是对经济行动，难得有切合实际的、具体的引导。

虽然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变化了，但无政府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抨击则引人注目地始终保持一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拒绝投票，拒绝把自己和任何政党或改良主义运动联在一起——直接地抨击非正义行为，而不乞求有更多的法令、委员会或政府的行动。1940年去世的埃玛·戈德曼是妇女解放运动、节育运动、免费学校

运动和结束资产阶级婚姻的斗争的奠基人。^⑮ 她的批判和推进立法或改革司法无关：她抓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许多现代的激进分子是她的信徒。

可以用妇女解放的问题来说明我的论点。真正激进的妇女并不要求有更多的法令或者在企业、政治的或教育的机构中有更多的女性代表。这些事是无关宏旨的。真正激进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寻求的是根据新的原则评价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求消灭权力不平衡的婚姻制度，消灭女方在婚姻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要求。他们同样要求男性的解放。有如两个激进的妇女所宣称的：

性与爱情对女人来说，早已被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所玷污，以至于一锤子买卖的恋爱与婚姻看上去象是上当和受骗。我们分不清楚我们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和要给予他们什么，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在家里和在工作中）是不依赖于男人的。象所有被压迫的人民一样，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自主。^⑯

人们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前提。国家通过堕胎的法律，干预到私人的领域中来。国家由于在人的关系中的特许地位而得以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恋爱的提倡者——提倡废除结婚，因而也废除离婚——并不是古怪或反常的人。他们是自由本身的拥护者。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革命尚未迫近，于是试图用别的方法进行社会的基本改革。他们的主要前提是：改造人们的心灵应从儿童开始。他们这样假定：在无政府主义原则下快乐地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孩子们可以作为新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改变的第一步。百年来，无政府主义者——从巴枯宁到保罗·古德曼——极力主张教育自由。学校——由政府开办和管理的——都是灌输国家权力论的工具。即使它们不是那么“爱国”，宣扬的也都是既定的价值标准，诸如经得起竞争、有社会地位、性的抑制和商业伦

理学。在美国，最老的免费学校——新泽西州斯代尔敦的“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从1915年起至1950年止，整整一代儿童产生出来了；他们令人惊奇地摆脱了竞争和好胜，而这正是绝大多数公立小学毕业生的特点。今天数百个免费学校中的许多学校，在类似的前提下工作。这个前提就是：改变世界必须从头开始，而天然的工具则是孩子^{②0}。

这类计划试图用新的原则来衡量价值。无政府主义的敌人宣称，这完全是虚无主义。一些评论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热衷于摧毁权力的过程中，想要摧毁男人中间的传统约束，这种约束是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所必需的。然而，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是信教的（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他们愉快而自觉地奉行宗教仪式，他们许多人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托尔斯泰是最早把信仰上帝与坚定地反对国家权威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人们中间的一个。有一个信教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制定符合圣经的原始道德：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对待别人就象我们希望他们如何对待我们一样。彼此相爱，互相宽恕，不要搞审判，不要去寻求赔偿损失费，应时时关心他人更大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求。^{②1}

这种宗教的理想主义常常引向和平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暴力行动主义揭穿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暴力的成见。从梭禄到托尔斯泰到甘地，无政府主义者和权力分散论者显示了不抵抗的方法，即用非暴力反对暴力的方法，能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引起人们良心上的反应。当然，这种非暴力活动，不能造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由甘地的斗争而产生印度国家，^{②2}但是埋藏在理想之中的反抗传统是存在的。

从六十年代早期，以美国民权运动为起点，接着是越南战争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特别是天主教的工人运动，都是采取和平主义的方法。过去十年，反对征兵的人们，出于对非正义战争

道义上的厌恶，他们去坐牢或者逃亡国外，以此表明他们拒绝合作，忠于和平主义的信条。所有那些在国家的强大权威面前变得软弱而不予以回击的抗议者们，未必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行动有助于加强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困扰国家，把它作为一种不道德的力量暴露在公众面前。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达里市长的警察殴打示威群众，逼得群众不得不自发地大声呼喊：“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注视着。”

无政府主义的伦理主义，引向既空想，又教条的立场。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对待政治的态度是明确的：政治牵涉权力和权势的分配，无政府主义者既然蔑视权力和权势的代表，他们就不会有政治舞台，不会有利用国家的任何计划。无政府主义者无视参政权，不象马克思主义者，妄想以增加选票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贬损任何使政府权威合法化的方案，以及任何象征个人自由系由政治实体授与的方案。

这种教条主义有相当大的价值：它既产生一种政治批评，又产生一系列消除权力集中的具体方案。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有了反政治的情绪。留意一下这十年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惯用语吧：撒谎者、可靠性之间断、帝国主义者、半斤八两、水门、空白磁带、弹劾。真实生活中的事件是和一些口号相适应的：越南战争，官僚政治的全面和大量的增长，公开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审讯抗议者，把对法律作狭义解释的人，充塞到最高法院的打算，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无所不在的窥探，公务人员受贿事件的不断泄露，自然，还有总统犯有重罪或轻罪的证明。同往常一样，所有这些造成了对政府的极为不满的情绪。很多非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华盛顿，这点是清楚的，但是在国家权力的用途问题上表现的普遍的悲观主义却增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